

外研社 高等英语教育学术会议文集

跨学科视域下的当代译学研究

Transla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主 编：胡开宝 副主编：陶 庆 朱一凡 王 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外研社 高等英语教育学术会议文集

跨学科视域下的当代译学研究

Transla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顾 问：刘龙根 周国强

主 编：胡开宝

副主编：陶 庆 朱一凡 王 斌

编 委：(以汉语拼音为序)

郭鸿杰 胡开宝 邵志洪 陶 庆 王 斌

王金波 王 敏 吴 勇 夏玉蓉 余继英

赵 勇 朱一凡 左克文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学科视域下的当代译学研究 = Transla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汉、英 / 胡开宝主编.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2
(外研社高等英语教育学术会议文集)
ISBN 978-7-5600-8167-0

I. 跨… II. 胡… III. 翻译理论—文集—汉、英 IV. H0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8593 号

出 版 人: 于春迟

责任编辑: 郑丹妮

封面设计: 张 峰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7.25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0-8167-0

定 价: 35.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181670001

论跨学科视域下的当代译学研究： 趋势与问题（代序）

胡开宝

0. 引言

上海交通大学翻译与词典学研究中心分别于2006年5月12日至15日和2007年3月30日至4月2日举办了“翻译与跨学科研究”及“语料库与译学研究”等专题国际学术会议（为方便起见，下文中称前者为06年会议，称后者为07年会议）。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Mona Baker 教授、南京大学张柏然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潘文国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王克非教授等国内外知名专家，以及来自世界十几个国家或地区的学者参加了这两次会议，并发表了数百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分别从文化研究与翻译和语言学与翻译等视角探讨了不同学科理论在当代译学研究中的应用，体现了当代译学非常显著的跨学科研究态势。

1. 文化研究与翻译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译学界开始依据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等从文化层面研究翻译本质、翻译策略以及翻译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等理论问题。翻译学的文化研究日益成为当代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翻译研究正越来越转向文化研究，并成为文化研究的一部分”（Luise Von Flotow 1997: 1）。06年会议共收到相关论文55篇，占这次会议论文总数的30%，这正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缩影。

1.1 文学理论与翻译

翻译与文学创作有许多共性。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常常被视为创作。两者不仅都涉及作者、文本与读者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都与社会文化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以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常常应用于翻译研究之中。在06年会议上，代表们从叙事理论、后殖民主义、巴赫金对话理论和解构主义等角度研究翻译的作用、翻译与政治的关系、译者与译文读者的关系以及翻译策略等。

翻译一直被视为不同语言文化间沟通的桥梁，但在曼彻斯特大学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Mona Baker 教授看来，翻译所发挥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她在题为“叙事学理论与翻译中冲突的处理”（Narrative Theory and Handling Conflicts in

Translation) 的主题发言中, 创造性地运用叙事学理论研究翻译在处理冲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她认为翻译决非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副产品, 而是实现上述发展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翻译不是桥梁的建造, 而是叙事语篇的流通和推广。她的研究进一步论证了翻译不仅反映社会文化、政治或意识形态, 而且有力推动着后者的发展。这一研究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丰富了翻译学文化研究的内涵。

翻译活动从发端之初便已刻下深刻的政治烙印。揭开翻译的政治面纱, 权力和暴力等便昭然若揭。南京国际关系学院葛校琴教授依据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论述了翻译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 她肯定后殖民主义理论对翻译研究的积极意义。在她看来, 从后殖民主义视角考察翻译文本的选择和具体翻译方法的运用, 可以提高我们对翻译交流过程和译品流通过程中英美文化帝国主义扩张的警觉。另一方面, 她认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所主张的为遏制西方语言霸权而高扬的抵抗策略有可能使翻译陷入一种二元论的循环, 促成另一类民族中心主义的滋长。因此, 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中国翻译研究需要克服一种“本土焦虑”情结, 抛开东方—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套路, 不要将所有的西方对东方之“看”都夸大为“文化殖民”, 应该将其视为一种文化隔膜。与许多相关论述相比, 这一观点无疑更具理性和说服力。

本质上, 翻译是一种特殊的对话。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导师胡全生教授依据巴赫金的对话理论, 系统阐述了译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译者与译文读者的关系是对话关系。但是, 由于译者是个有限的创作者, 译者翻译时既要揣摩其读者, 也要在与原作者对话时聚精会神地听——二者均是为了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顺利对话这一最终目的。上海交通大学尚必武博士从解构主义“异延”观、文字和意义的可重复性以及语言碎片化等理论切入, 论述了复译的理据, 阐明了前译本与复译本之间的悖论式关系, 即任何翻译都是复译, 而任何译文既是前译本又是复译本。中南大学屠国元教授和李静博士阐明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他们指出在距离合法性的视角下, 译者应该知情选择当译之本, 适当顺应, 贴近选材, 走进原作, 与作者产生情感共鸣, 生产相对完美的译作, 消融距离。应当指出, 上述论述有助于统一学界对于译者与译文读者以及译作与原作之间关系的认识。

1.2 文化理论与翻译

众所周知, 译学研究发生文化转向的主要标志是欧洲“翻译学派”的崛起。该学派研究译文产生的文化背景, 译文对译入语的文学规范和文化规范的影响, 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等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策略等的影响, 其代表性成果有勒费弗尔的改写论、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斐米尔的目的论、赫曼斯的操纵论等文化理论。在 06 年会议上, 来自中国大陆的代表

结合英汉文学翻译史和翻译作品的个案分析，对于这些文化理论作了具体诠释和令人信服的论证。西北师范大学姜秋霞教授作了题为“论意识形态对外国文学译介的影响”的大会主题发言。她对于20世纪初（1910—1931）刊登在《小说月报》和20世纪末刊登在《译林》上的翻译小说的主题和输入来源做了调查统计，并对比分析了 *David Copperfield* 世纪初和世纪末出版的三个汉译本中涉及意识形态的语言翻译策略，论证了意识形态在外国文学译介过程中的影响。她指出源语与译入语社会意识形态的对应程度与译介转换策略的“改写程度”具有很大关系，对应程度越低，改写程度越高。复旦大学刘敬国博士详细考察了大卫·霍克思翻译的《红楼梦》译本中的“讹”。他指出该译本中文化信息传达上产生的“讹”体现出西方世界的文化霸权主义，反映了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上海交通大学魏先军硕士基于《汤姆·索亚历险记》的汉译文本分析，论证了目的论的普适性，即翻译行为的目标决定了译者要采取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上述研究均属实证研究，或运用数据统计，或采用个案分析，论证严密。

不过，必须指出，一些研究似乎过分强调或夸大了意识形态或权力话语对于翻译活动的影响。诚然，意识形态的确对翻译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非绝对影响。上海体育学院谢进喜硕士认为现有关于意识形态对翻译影响的研究存在一些偏颇：1) 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对翻译行为的操纵，忽视翻译对意识形态的强化与颠覆；2) 强调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围困，忽视翻译主体超越意识形态的主观能动性；3) 强调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忽视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杂合与共生。该文在系统梳理关于意识形态对翻译影响的研究基础上，就前者对后者的影响进行理性的反思，纠正了人们对于意识形态与翻译关系的错误认识。

2. 语言学与翻译

翻译从诞生之日起便与语言学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任何文本的翻译都涉及词句、语篇、语境和语用等层面的理解和分析，而这些分析都离不开相关语言学理论的指导。因而语言学研究范式一直是译学研究的主要范式之一，即使在译学研究发生文化转向的当代也不例外。20世纪下半叶以来，译学界从阐释学、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文化理论角度开展翻译研究，拓宽了译学研究的领域，但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无法回避对语言的关注，因为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要论证意识形态等文化元素对翻译的影响，必须以翻译文本的语言事实为依据，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等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均离不开翻译文本的语言学分析。克里斯汀·诺德（Christiane Nord）认为“文化转向引导人们关注了语言以外的东西，而不是代替了语言学研究途径。……语言学将继续处于

翻译研究的文本中心位置”（张美芳 2006）。莫娜·贝克尔（Mona Baker）指出：“现代语言学跟其他相关理论一样对翻译研究是重要的，这种重要性从来没有停止过，将来也不会停止”（张美芳 2006）。从这两次会议的论文发表情况来看，语言学研究范式在译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便可窥一斑。据不完全统计，06 年会议发表的关于语言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应用的论文占该次大会论文总数的 60%。07 年会议共发表相关论文 70 余篇。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阐述了语用学、认知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等理论在译学研究中的应用。

2.1 语用学与翻译

语用学形成于上世纪下半叶，是研究语言使用和语言交际的语言学分支学科。近几十年来，翻译界从语用学视角进行翻译研究。在 06 年会议上，语用学原理尤其是关联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话题。华东理工大学黄昌静硕士以关联理论为依据，基于对杨宪益和霍克思（Hawkes）翻译的《红楼梦》英译本语料的分析，阐述了双关语铰链，即双关词中各种交际提示对翻译的指导 and 限制作用。作者认为双关语翻译的关键在于铰链的翻译。为在译文中再现双关语的双重含义，译者必须向译文读者提供原文铰链的交际提示，以实现最佳关联。新西兰奥克兰大学金莹硕士以关联理论为依据，分析对口译过程施加影响的认知因素，并试图建立关联理论观照下的口译模型。这些研究成果阐明了关联理论对翻译实践的应用价值。值得一提的是，金莹硕士的研究成果在口译研究领域尚不多见，尽管其研究深度有待加强。

此外，与会代表还从其他视角探讨了语用学原理在翻译中的应用。上海交通大学吴勇博士以言语行为理论为依据，基于话语标记语“well”语用功能的分析以及张谷若翻译的《大卫·考波菲》汉译本的个案分析，阐述了译者再现话语标记语“well”语用功能的得失。作者指出“well”作为话语标记语本身没有命题意义，但是具有言外功能。译者应尽可能在译文中再现“well”的语用功能。福建漳州师范学院吴克炎受语义透明度的启发提出语用透明度这一概念。他强调合理把握话语的语用透明度能取得不同语用效果，这对于保证翻译活动的正常进行，提高译文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山西大学王晋瑞从语用学的交际者意图这一概念出发，讨论了超额翻译和欠额翻译的具体原因。他认为原文作者意图包括信息意图、语境互明意图和交际意图。译者对译文读者和原文作者是否共享语境互明意图的错误估计是导致翻译超额和欠额现象的原因。作为话语标记语，“well”看似简单，但要在译文中准确传神地再现其语用功能并非易事。吴勇博士从言外功能比较分析入手，有效解决了如何翻译话语标记语“well”这一疑难问题。而语用透明度概念的提出及其在翻译中的应用，以及共享语境互明意图与超额和欠

额翻译关系的阐述等不乏新意，令人感到耳目一新。

2.2 认知语言学与翻译

认知语言学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其重要标志为Lakoff（1980）和Langacker（1987）著作的出版，以及1989年在Duisberg认知语言学专题研讨会的举办。90年代以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迅速发展，认知语言学在译学研究中的应用愈来愈得到学界的关注。

许多代表从概念隐喻、象似性和意象等认知语言学基本概念切入，探讨了诗歌翻译的策略和方法。浙江大学肖家燕博士认为不同语言的诗歌往往通过一系列的意象或结构隐喻地建构一个中心概念或诗歌主题。一个主题通常表现为一个概念隐喻，一首诗歌就是一个概念隐喻。因此，诗歌翻译可以从概念隐喻入手，通过概念隐喻的转换实现诗歌主题的翻译。合肥炮兵学院巫阿苗硕士根据象似性理论，探讨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译策略和方法。作者指出中国古典诗词象似性特点比较突出。翻译过程中采用象似性的视角和切入点，有助于实现译文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从而达到“形神兼似”的理想翻译效果。华东理工大学赵朝永硕士分析了中国古典诗词意象组合方式，即意象的复合、叠加、并排、连锁和通感等，并结合具体翻译实例的分析详细阐述了诗歌翻译中意象构建的认知编码。在作者看来，诗歌意象的组合遵循人类认知的一般规律，原文语言形式所构建的认知意象图式是诗人独特认知体验的表征。译者应通过语言线索解读原文意象图式，并在译文中根据初始认识视域的焦点调整，加以再现，实现诗人心理的认知诸要素在译文中的同步转换。诗词翻译在所有翻译活动中最富于挑战，难度最大。不少学者主张诗词不可译，因为诗与语言本身、民族习惯和文化沉淀密切相关。其他学者认为诗词翻译只能求“神似”，“形神兼备”是诗词翻译无法企及的目标。然而，以上研究成果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探讨了诗词翻译如何达到“形神兼似”的理想效果，证明了诗词翻译不仅是可行的，而且能做到“形”和“神”的统一。

另外一些代表则具体分析了解释翻译认知过程及译者主体思维特征。复旦大学腾梅博士运用图式理论分析翻译过程和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她指出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同时激活两套图式，即源语图式和译语图式。前者帮助译者理解原文内容和表达方式，后者可以帮助译者将原文信息重新表达出来。当译者强调源语认知图式的还原，所用的翻译策略便为“异化”，若着眼于译文读者的认知图式时，采用的翻译策略是“归化”。

2.3 语料库与翻译

近十几年来，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及描写性译学的兴起，译学界开始将

视线投向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语料库译学因此逐渐发展为独立的译学研究范式。07年会议上，国内外学者发表了语料库与翻译共性、语料库与译者风格以及语料库与翻译教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

2.3.1 语料库与翻译共性研究

翻译共性是指翻译文本典型的语言特征，主要包括显化或明晰化、简化和范化等，其形成的直接原因是翻译过程本身。Mona Baker (1993: 243-245) 指出翻译共性主要表现为：1) 译文显化程度显著提高；2) 消除歧义和简化；3) 合乎语法性；4) 避免重复；5) 超额再现目标语语言特征；6) 翻译过程常常导致某些语言特征表现出特定的分布类型。上海交通大学胡开宝博士和陶庆副教授基于自建的汉英会议口译平行语料库 (Chinese-English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Corpus)，研究汉英会议口译中的语篇意义显化。研究发现，在汉英会议口译中，译员倾向于使用连接词“that”、不定式符号“to”和逻辑关系连接词明示原文语句之间关系，而“这个+名词”的结构也常进行显化处理，语篇意义显化程度因此十分显著。究其原因，是因为英汉语言之间的差异、译员“简化”的思维趋向及其采用的口译方法。台湾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史宗玲副教授比较分析了商业技术文本和小说文本等的汉译本中连接词的显化程度，强调翻译文本显化程度的研究应将文体及翻译策略等因素考虑在内。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Wen Tinghui 博士也运用语料库方法，论证了英语侦探小说汉译本中的简化倾向。

2.3.2 语料库与译者风格研究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翻译策略的选择和翻译文本的具体形态必然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如译者的风格偏好。香港中文大学李德凤博士在进行相关数量分析的基础上，论证了《红楼梦》大卫·霍克斯译本和杨宪益译本译者风格的差异及其原因，并指出译者的翻译动机、赞助商及读者等因素都会影响译者翻译风格的形成。英国帝国理工大学 Meng Ji 博士基于塞万提斯《堂吉珂德》两个汉译本中成语使用频率的考察分析，论证译者风格不仅因人而异，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南京大学朱玉彬博士分析了《名利场》杨必译本分号的使用频率，指出译者采用归化策略翻译以分号结尾的英语语句。上海交通大学康美琳和张子哲硕士分别对莎士比亚戏剧梁实秋译本和朱生豪译本中人称代词和称呼语的翻译进行定量分析，详细论述了两位译者的不同风格及其成因。

2.3.3 语料库与翻译教学

语料库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 平行语料库可以提供大量翻译语料，使学生了解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2) 平行语料库可以发挥资源库的作用，方便学生查询源语具体词汇的不同对应词或翻译处理方法，指导

学生的翻译实践。3) 学习者翻译语料库可应用于翻译教学大纲和翻译测试等方面的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王克非教授指出平行语料库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可以帮助学生建立关于翻译的意识，改变传统翻译教学中的规定性方法，让学生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香港城市大学朱纯深教授赞同王克非教授的观点，认为平行语料库的应用可以提高翻译教学和翻译学习的效率，使学生成为翻译教学活动的中心。

3. 我国当代译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普遍认为，我国当代译学研究朝着多元化和跨学科方向发展。在这两次国际研讨会上，国内代表所发表的研究成果便生动地体现了这一发展趋势。他们研究的视角主要涵盖认知语言学、语用学、篇章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和语言对比研究等语言学学科，接受理论、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解构主义、阐释学和巴赫金理论等文学理论，目的论和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以及伦理学等。此外，一些国内学者还依据科学发展理论、人类学和传播学原理探讨翻译学的演变和翻译本质，如鲁东大学贾正传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刘珩博士和华中科技大学肖胜文的研究成果。

应当指出，我国当代译学研究不断吸取着多种学科的学术营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是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望尘莫及的。近年来，发表、出版的译学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是这些成果大多数只满足于引介西方译学理论或一味盲从并套用西方语言学、文学、文化和译学理论探讨汉外或汉外翻译的具体问题，为西方理论的适用性提供注脚。这些成果往往沦为西方理论的“传声筒”，缺乏应有的学术原创性。我们承认西方理论的引介和运用无可厚非，它在中国翻译学建设的初期是必要的。但是，当代中国译学如果仅仅停留于这一阶段，则不可能真正走向世界。杨平（2003）指出“这种追尾国外的研究路向的被动研究和机械照搬不利于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学科建设的发展，也不可能使中国的翻译理论话语真正融入世界译学大系，受到国际译学界的关注和认可，在国际译坛参与平等的对话和交流。”鉴于此，我们提倡在深刻理解和消化包括西方译论在内的西方理论基础之上，分析并论证西方理论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及其对汉外或外汉翻译的适用性，创造性地吸收这些理论的营养成分分析或解决实际问题，或结合我国汉外或外汉翻译实践对这些理论进行适当的修正和发展，推翻已有理论，进而提出新的观点或理论。只有这样，我们的翻译研究在国际译坛上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真正实现中西译论的交融和发展。

南京大学张柏然教授在06年研讨会上作了题为“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学应

对策略”的主题发言。根据他的观点，要打破目前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翻译研究的理论僵局，中国翻译界应采取三大策略，即中国古典译论的现代化，西方译论的中国化，和“五四”以来的现代译论的当下化。二十多年来，我国译学界在西方译论的中国化方面投入了很多精力，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虽然其学术原创性有待加强。而另外两方面的研究尚未得到译学界的充分关注，尽管有少数学者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如南开大学王秉钦教授等，但译学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却屈指可数。我国拥有数千年的翻译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为我们在翻译研究中挖掘并利用这些遗产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事实上，系统研究中国传统译论并予以现代诠释，运用中国传统文学、文化和哲学理论指导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可以为翻译研究提供全新的视角，并有望取得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从而推动我国翻译学理论的完善及最终构建。在杨自俭教授（2002）看来，中国传统译学的继承性研究和外国译学的借鉴性研究是翻译学学科建设的两个重要支柱。而且，尤为重要，传统译论的挖掘与整理，以及不同传统理论的应用对于在日益全球化的当代创建具有中国文化鲜明个性并富于生命力的翻译学派，应对全球化给我国翻译研究带来的挑战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正如张柏然教授在大会发言中所指出的，中国学者必须拥有自己的立足点，这个立足点就是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

参考文献

- Baker, M. 1993. *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mplication and application* [A]. In *Text and Technology: In Honor of John Sinclair*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Flotow, L. V. 1997. *Translation and Gender: Translating in the Era of Feminism*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Lakoff, G & M,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ngacker, R.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杨平, 2003, 对当前中国翻译研究的思考 [J], 《中国翻译》(1)。
- 杨自俭, 2002, 关于译学研究的一些想法 [A]。《面向 21 世纪的译学研究》[C]。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张美芳, 2006, 《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M]。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目 录

论跨学科视域下的当代译学研究：趋势与问题（代序） 胡开宝 iii

上 篇 文化与翻译

从巴赫金的对话性看译者与读者的关系 胡全生 3

《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文化旅游视角 辛红娟 16

复译的解构主义阐释之维 尚必武 25

距离合法性视角下译者当译之本的知情选择与情感同构 屠国元 李静 34

论晚清翻译与时代精神的契合 蒋林 43

翻译误区与汉语的畸形欧化 朱一凡 50

鲁迅“硬译”论的旅行：历史转移与启示 于德英 58

目的论视角下英语儿童文学作品中词汇汉译

——以《汤姆·索亚历险记》中译本为例 魏先军 庄来来 66

当代翻译学系统演化观

——用系统观考察当代翻译学发展模式的尝试 贾正传 75

试论维特根斯坦对“私人语言”的批判及其哲学意蕴 晓妮 87

中 篇 认知与翻译

诗歌翻译的认知意象编码 赵朝永 邵志洪 95

关于翻译研究的图式理论阐释 滕梅 107

从象似性角度看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译 巫阿苗 114

“心思维”在翻译中的工作机制 吴志杰 124

下篇 语料库与翻译

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习语及其翻译研究 刘泽权 朱虹 137

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句级对齐研究 邹颂兵 153

基于语料库的莎士比亚戏剧《爱的徒劳》汉译本中人称代词人际意义的
构建研究 康美琳 165

基于语料库的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中称呼语的翻译研究 张子哲 173

Phraseology and Idiomaticity: A Progress Report on a Corpus-Based
Study of Two Contemporary Chinese Versions of Cervantes' *Don Quixote*
..... Meng Ji 184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in Translator's Style: A Case Study of the
Two Translations of Hemingway's Work Yu Ching-hua 191

Investigating Simplification in Translated Chinese: A Corpus-Based Study
..... Wen Ting-hui 205

Translation Density: A Numerical Measure of Conciseness in Translation
..... Rebecca Tai Wallace Chen 219

Sentence Openings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Translations:
Some Quantitative Findings Teng Minchun 235

An Evaluation of Yang Bi's Translation of *Vanity Fair* with a Special
Reference to Semicolon in Use Zhu Yubin 245

上 篇 文化 与 翻 译

从巴赫金的对话性看译者与读者的关系

胡全生

摘要：依据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是种对话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作者创作时必须揣摩读者的统觉背景。同样，从译者在翻译时也是创作来说，译者与其读者的关系也是种对话关系。但是，由于译者是个有限的创作者，所以译者翻译时既要揣摩其读者，也要在与原作者对话时聚精会神地听——二者均是为了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顺利对话这一最终目的。

关键词：译者；读者；对话性；统觉背景

1. 巴赫金的对话性

什么是对话性？

先来看看什么是对话：“用巴赫金的话说，对话是‘同意或反对关系，肯定和补充关系，问和答的关系’”（董小英 1994：3）。

“尽管对话是对话性的基础，但并非对话性”（同上：6）。巴赫金自己给对话性下的定义是，“对话性是具有同等价值的不同意识之间相互作用的特殊形式”（同上：7）。对此定义，中国学者董小英解释说，“如果不是在对白中，而是在独白陈述中，在人与人的意识的关系中，也出现这种同意和反对的关系，肯定和补充的关系，问和答的关系，就叫作对话性”（同上：18）。

巴赫金的对话性是与他的语言论分不开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的第五章篇首，巴赫金指出自己的分析“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的”，而是“属于超语言学”，“超出了——而且是完全正当地超出——语言学的界限”（Bakhtin 1981：181）。他解释说：

在作为语言学对象的语言里，没有也不可能有对话关系：这些对话关系不可能存于语言系统的元素之间（比如，存于词典的词汇之间，存于词素之间，等等），也不可能存于以严格的语言学方式来探讨的“文本”的元素之间。这类关系既不可能存于单一层次的单位之间，也不可能存于不同层次的单位之间。当然，它们还不可能存于句法单位之间，比如以严格的语言学方式来探讨的介词之间。

当以严格的语言学方式来探讨文本时，文本间也不存在对话关系。……

当然，语言学承认“对话言语”的结构形态，研究其句法特征和词义特

征。但是，它是将它们作为纯语言现象来研究的，也就是说，是在语言层次上来研究的，而且，它完全不可能处理对话中应答之间的对话关系的特定本质。因此，当语言学研究“对话言语”时，它必须利用超语言学的成果。(Bakhtin 1981: 182-183)

就此，巴赫金推断说：“对话关系故而是超语言学的。”“但同时，”——巴赫金立即指出——“对话关系绝不可分离于话语领域，即作为具体的综合现象分离于语言。语言仅仅生存于语言使用者的对话交际之中。对话交际的的确是语言生存的真实领域。语言的整个生命，无论在哪一运用领域（日常生活、商务、学术研究、艺术等等），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这些对话关系存于话语领域，因为话语就其本质来说是对话的；因此对话关系必须由超语言学来研究，超语言学超出了语言学的局限，具有其独自的内容和任务”（同上：183）。

依据美国学者霍奎斯特的看法，巴赫金一生所做的笔记中虽然时常出现“对话”（dialogue）一词，但“对话性”（dialogism）一词却是从未用过（Holquist 1990: 95-96）。霍奎斯特认为，创立对话性这一概念的基石是“大脑不能等同于世界”（同上：98）。“在对话性中，具有意识的能力是基于他性（otherness）之上的。”“在对话性中，意识就是他性。说得更准确些，它是中心与非中心的不同关系”（同上：98）。“对话性认为一切意义都是相对的”（同上：100）。这就是霍奎斯特说的巴赫金具有的第三只耳朵，就是这第三只耳朵“让他能够听到别人仅仅看到相同的地方存有的不同”（Holquist 2003: 183）。

巴赫金的对话性是现象学意义上的对话性。对于巴赫金来说，对话即是一切。“存在即意味对话性交流。当对话结束时，一切都结束”（Clark 1984: 86）。“语言要有意义，是一个人在对另一个人说话时，甚至是在这另一个人是一个人自己内心对话的对象时”（Holquist 1981: xxi）。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实际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他在独白叙述中发现的双声现象，以及文本中的复调现象，……另一部分是创作过程，对话过程，这是作者无法创造的东西，他为了达到通过文本与读者对话的目的，必须遵循其规则，如创作时必须揣摩读者的统觉背景”（董小英 1994: 58）。这里，正是这第二部分与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有关。

2. 作者与读者的对话

毋庸置疑，作者写作是为了让人读，而一旦有人读，对话则形成。作者为了达到此交际或对话目的，他必须揣摩读者的统觉背景。